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总主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　勇

学术著作

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

——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

张礼慧　等◉著

外借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2013年度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重大委托研究项目
2021年重庆师范大学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学术著作

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
——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

张礼慧 等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 / 张礼慧等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21.12
ISBN 978-7-229-16431-7

Ⅰ. ①抗… Ⅱ. ①张… Ⅲ. ①音乐—抗战文艺研究—重庆 Ⅳ. ①J6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71217号

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

KANGZHAN DAHOUFANG YINYUE YANJIU
—YI ZHANSHI SHOUDU CHONGQING WEI ZHONGXIN

张礼慧 等 著

责任编辑：李 茜
责任校对：何建云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2.25 字数：330千
2021年12月第1版 202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6431-7
定价：8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编纂委员会

总 主 编：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副总主编： 周　勇　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西南大学教授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敏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山田辰雄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方德万　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巴斯蒂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王建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王斯德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川平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

西村成雄　日本放送大学教授

麦金农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齐世荣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米　德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教授

汤重南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刘庭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李忠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李红岩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历史研究》主编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任贵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朱汉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海鹏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张玉发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张国祚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原主任、教授

张　力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何　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

杨天石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杨瑞广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杨天宏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步　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汪朝光　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玛玛耶娃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教授

邵铭煌　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原主任

陈　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陈廷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陈谦平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陈鹏仁　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中国文化大学教授

吴景平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金冲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周永林　重庆市政协原副秘书长、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荣维木　《抗日战争研究》原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郭德宏　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徐秀丽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史研究》主编

徐　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彭南生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傅高义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
蒋永敬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专任教授
简笙簧　台湾国史馆纂修
谢本书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温贤美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廖心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熊宗仁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
潘　洵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魏宏运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编辑部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朱高建　刘志平　吴　畏　别必亮　何　林　黄晓东　曾海龙　曾维伦

总　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起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近9年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了军国主义的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国家,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到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政变使日本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是疯狂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因此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地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

光荣，但却受之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这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非常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曾任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肩负起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的使命

——《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序

周　勇

今天，我听到的第一曲音乐是天安门广场国庆升旗仪式演奏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正是这坚定的民族意志、激昂的乐声、排山倒海的气势，召唤我们居安思危，不忘历史，追逐梦想，奔向未来。

80多年前，抗战音乐是唤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呐喊，是号召中华儿女舍生忘死投入抗战伟业的号角。今天，抗战音乐是中国人民殊死奋战的历史记忆，是点燃民族精神伟力的不灭火炬。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有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以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根据地为依托，领导抗日军民开辟了敌后战场，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几十年来，我们对抗日根据地音乐的研究和整理是深入的，成果是丰富的，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黄河大合唱》等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的坐标。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相比之下，学界对抗战大后方音乐的研究和整理却比较滞后，大后方音乐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及取得的成就，与目前的研究和整理水平极不相称。

抗战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重庆由一个地方城市一跃成为享誉世界的国际都市。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人民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与此同时，重庆成为中国大后方抗战文化的高地，各类文化精英聚集在重庆、昆明、桂林、成都等城市，产生了一大批文化精品，为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形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在中国先进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但这也是当下历史价值最重要、发展现状最薄弱、抢救保护最紧迫的历史文化资源。其中包括抗战大后方音乐历史资源，既有保护不够的问题，更有整理不够、研究不足的问题，在学术上还有不少等待我们回答的问题。

2008年以来，重庆市实施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重庆抗战工程”），包括学术研究、遗址保护、史料整理、文艺创作、设施建设和对外交流六个部分。这是一项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文化工程，也是近年来在抗日战争史研究方面最具雄心和影响力的区域性研究计划。学术研究是这项工程建设的基础。十年来，我们从“抗战大后方”概念的提出和界定、一大批研究项目的实施，到海内外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再到专门学术研究机构的建设、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此基础上，各类专史的研究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十年来，我们投入了相当的力量，对其进行了基础性资料搜集与历史研究。我们从易到难，从一般到个别，先整理档案文献材料，再进行中观和个案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初步收获了《重庆抗战史》《重庆抗战图史》《西南抗战史》《抗战大后方歌谣汇编》《大后方抗战诗歌研究》《大后方电影史》《抗战八年广播纪》《战火硝烟中的画坛》《传承与探索》《中国抗战大后方出版史》《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研究》《抗战大后方工业研究》《抗战大后方金融研究》《抗战大后方教育研究》《走向平等：战时重庆的外交界与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曙光（1938—1946）》《史迪威将军与中国战区统帅部影像集》等学术专著和一大批学术论文，迈开了抗战大后方

文化研究的第一步。但是，面对这丰富的收获，我们也不无遗憾，那就是被称为“抗战号角”的大后方音乐研究论著仍旧缺如。音乐无形，但音乐的力量无限！我们应该如何开拓这个研究领域?！如何弥补全面研究大后方音乐历史论著的空白呢?！如何在传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上尽我辈的责任?！2013年，重庆师范大学主动请缨，市委宣传部便把“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课题委托该校研究，由张礼慧教授担纲首席专家。

张礼慧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她20世纪90年代初从中国音乐学院歌剧系毕业，然后远赴美国科罗拉多歌剧中心深造，获美国科罗拉多歌剧咏叹调比赛第一名，并应邀出演多部西洋歌剧名篇。1992年，获得第五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美声唱法第三名；1996年获第七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美声唱法第一名。随后出演了一系列大型歌剧的女主角。特别是由她担纲主演的气势恢弘的大型歌剧《巫山神女》一举夺得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国际艺术节白玉兰奖、首届巴渝文学奖、文华新剧目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届中国戏剧节优秀表演奖。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一级演员、重庆市歌剧院副院长、重庆市文联副主席、重庆市音乐家协会主席、教育部国家级声乐培训专家、教育部教育委员会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声乐学会副主任等职务，2015年荣获“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头戴多项艺术桂冠，处在艺术巅峰时期的张礼慧，却毅然选择了从舞台转向讲台，担任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当我们惊愕张礼慧的选择时，发现她在院长的岗位上，褪去了舞台的喧嚣，在静心教学的同时获得了更多的思考，提出了艺术教育和学术研究并举，教学与科研两手发力的思路。一方面，加强教学实践，培养一批又一批学生，在艺术表演和艺术教育上下功夫，这些“张礼慧的儿女们”如今已经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另一方面，她把舞台经验升华成理论思考，弥补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研究这块短板，进而将研究的视角从舞台艺术转向历史深处，选择最具重庆历史文化特色并与音乐教育密切相关的“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方向，担负起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的重任。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是张礼慧和她的团队向我们奉献的第一部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著作。它向我们全景式地展现了重庆抗战音乐的促推和宣传、流入和创作的代表歌曲、大后方舞台上投身抗战的各方音乐人、重庆迁建文化区的演艺音乐、城乡大众的抗战歌咏运动、专地专题专业的音乐活动、各艺术形态的时代旋律、重庆以至大后方的歌曲类型，也分析了抗战大后方歌曲音乐的广泛影响以及对后世发挥的作用。其中多有我们过去所不了解的艺术图景：

——艺术即人，星空闪亮。抗战时期，在国内外颇有名声的中国作曲家贺绿汀、沙梅、刘雪庵、陈田鹤、江定仙、王沛沦、邓耳敬、张文纲、赵枫、罗忠熔、吴祖强、杜鸣心，歌唱家黄友葵、蔡绍序、李志曙、张权、刘淑芳，演奏家马思聪、张锐、杨秉荪，指挥家黎国荃、司徒汉、郑小音等一大批音乐家，创作、演奏、演唱了《长城谣》《嘉陵江上》等，在重庆音乐发展的历史中留下了闪光的记载。

——群众歌咏，震撼心灵。抗战期间重庆最为广泛活跃的声乐艺术活动是群众性救亡歌曲演唱。在这里曾经创下“千人大合唱”“万人大合唱”的历史纪录，至今仍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曲目不仅有颇具难度的大型声乐作品合唱《黄河大合唱》，更有颇具历史影响的《游击队歌》《壮士骑马打仗去了》《胜利进行曲》《怀北平》《念故乡》《我所爱的大中华》等产生于这个时代的作品。

——交响云天，创业多艰。器乐的发展也可圈可点，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符合双管编制规范的“中华交响乐团”在重庆诞生，国内最早的具有专业水平的民族乐队在重庆诞生，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国立实验剧院管弦乐团、励志社交响乐团在重庆相继建立。纯音乐艺术在重庆的发展影响全国，人们曾经把重庆称为“中国交响音乐的摇篮”。

——民族歌剧，异彩首放。重庆还是中国第一部大歌剧的诞生和首演地。1940年，中国实验歌剧团在重庆组建，排演了中国第一部大歌剧《秋子》，由此拉开了大歌剧艺术在中国发展的序幕。随后，还演出了《苏武》《四季》《狮国之歌》《河梁话别》《牛郎织女》等不同类型的歌剧。在近代

历史上，重庆与延安、上海一起，成为早期中国歌剧音乐得到良好发展的地区，被人们称赞为中国音乐的“歌剧苗圃”，为整个中国歌剧艺术后来的成长壮大迈出了第一步。

——音乐教育，蓬勃展开。重庆还建立了很多音乐院校，以及音乐学科，如国立音乐院、中央大学音乐系、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育才学校、西南美专音乐科、蜀中艺专、长江音专、国立剧专乐剧科、中华剧专歌剧系。它们为中国培养了大量音乐人才。

——中外交流，硕果累累。荷兰外交官高罗佩撰写的《琴道》是中国琴史上的里程碑，中美英荷琴家交流切磋于天风琴社，中国国乐队对美英法苏大使和美国上将马歇尔的专场演出，中苏文化协会在国际广播电台举办的对苏音乐广播，中国和盟国组织的多种文化协会，通过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第一交响曲》、韦伯的《自由射手序曲》、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魔笛序曲》、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肖斯塔科维奇的《列宁格勒交响曲》等音乐作品的演出，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斗志。特别是以马思聪为代表的中国音乐家运用西洋管弦乐手法，创作了一大批经典名作，其中《绥远组曲》之第二乐章《思乡曲》，更成为第一首真正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国管弦乐和小提琴曲。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南方局于重庆，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首要任务。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文艺战线的统一战线便是题中之义。南方局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作为文化战线统一战线的领导核心；以周恩来为副部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了第三厅（后改为“文工会”），负责文化宣传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包括音乐家在内的文化艺术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他们以抗敌演剧宣传队为组织形式，群众性演唱抗日歌曲作为最重要的抗战动员方式，活跃于抗战大后方的山山水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大后方引领着“新音乐运动”的正确方向，培养了一大批音乐人才，更创造了在战时首都重庆团结各族各界民众举行“万人大合唱”的历史纪录。

十年前“重庆抗战工程”肇始之日，我就希望有学者担纲开拓抗战大

后方音乐这片沃土。十年后，张礼慧和她的团队终于为我们捧出了这从无到有、洋洋数十万言、图文并茂、沉沉甸甸的第一部抗战大后方音乐历史著作。这是一部千呼万唤的拓荒之作。他们的努力将写在中国音乐史上，写在中国抗战史上，更写在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历史上。

回首重庆抗战工程十年历程，我们在学科建设上的收获也是丰硕的：在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研究方面，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已经堪称重镇，汇集了统一战线史、国共合作史、日军无差别轰炸史、经济史、金融史、电影史、文学史等学科的学者；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在抗战大后方文学研究方面，四川美术学院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所在美术研究方面，都已经堪称重镇。

人们会问，未来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的重镇又将在何处？

张礼慧和她的团队已经勇敢地面对挑战，立下一个志向——以“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课题组为基础，朝着建设中国一流的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重镇目标前进。我对此是极表赞赏的。他们将努力于加强本土队伍建设，招募全球有志之士，合力培养能够扛鼎领军的青年才俊，努力争取承担一批市级重大项目和国家项目，撰写发表一批专题学术论著，创造条件增设音乐理论硕士点、音乐史博士点。同时，推动研究成果向音乐教学、表演的转化，努力建设热爱音乐、继承传统、守正创新、教研演并重的音乐学府。如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发宏愿，下苦功，把研究的基础打得牢牢的，把人才的培养抓得紧紧的，成果的丰收自然会水到渠成。

所以，尽管这部著作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并不担心。只要张礼慧们肩负起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的使命，有这部著作好的开头，继续鼓吹号角，高擎火炬，咬定青山，埋头苦干，收获之期，还会远吗？

写作于2017年10月1日

国庆68周年纪念日

修改定稿于2021年2月12日

农历辛丑年正月初一

（周勇，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原重庆市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西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抗战大后方音乐历史是一条大河

——《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序

黄晓东

我与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张礼慧“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团队联系交流甚多。也是喜欢音乐的缘故，很自然地十分关注他们的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多次与项目组交流，参加他们的研究会议，提出我对大后方音乐历史的认识。在研究过程中，多次与项目组同志专章讨论。书稿完成后，我又通看了一遍，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周勇会长和张礼慧院长让我给即将出版的本书写序，谈谈感想，我是很高兴的，也想借此谈谈自己对大后方音乐历史的认识。

在我的生命中，我与音乐有过三次际会：1971年早春，在重庆枇杷山公园红楼旁的一排平房里，我通过重庆市歌舞团乐队队长孟少卿等老师组成的考官们的严格考试，进入重庆市文化局学员队乐队，学习中音提琴，开始接触大量中国传统戏曲音乐和西洋音乐。在西皮、二黄唱腔，【夜深沉】、【万年欢】、【点绛唇】等戏曲曲牌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旋律之间徘徊，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音乐大师的艺术魅力。青葱岁月的音乐生活，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启蒙。1979年4月，我别乐从文，进入重庆市博物馆，驶入文物和书籍的海洋，接着到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读书，与图书文献、历史、文物和博物馆打上交道。2004年底，我以重庆市博物馆常务副馆长身份借调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推进组”任副组长，在电影、电视剧、戏剧、广播剧、歌曲、文学等方面联系全市文艺创作力量，努力推进重庆市文艺精品冲刺中宣部